



葵  
花

何玉茹  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葵花/何玉茹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09742-5

I. ①葵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6874 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
装帧设计 赵迪

责任校对 刘佳佳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0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875 插页 3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42-5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第一章

### 1

每天在前檐下晒晒太阳,已成了我这些年的习惯了。

如今有前檐的房子不多了,我这房子,前檐下还有几根粗壮的柱子,因为前檐伸得太长了。有时候老黑伸出舌头,我直想找根棍儿给它支起来,可总是刚起念头,老黑就把舌头缩回去了。我这前檐是永远不会缩回去的,它就像一个女孩子的裙裾,舒舒展展精神神的,仿佛随时都会飞扬起来。

人一喜欢晒太阳,就说明身体不行了。年轻的时候,我喜欢的是阴雨天,一条一条的雨线从天而降,四面是高高的瓦房,院子成了雨线的容器,角角落落都盛得满满的。我靠了前檐下的柱子,想象自个儿是个天女,白色的披风,五颜六色的飘带,飘带一甩就是一片云彩。那一挂一挂的竹帘子似的雨线,正是云彩或说是我的飘带变的。

晒太阳之前,我是要干点活儿的,一是扫地,一是把鸡窝打

开。地是屋里的、前廊上的、前廊下的院子的,全是老旧的方砖,每天扫,每天都能见到青色的砖末儿,风一吹,砖末儿不知到哪里了,留下的只是一块残缺。我用的是把黍糜子笞帚,扫得干净,不像高粱糜子的,扫过去会留下一道一道的痕迹。扫地如今对我来说是件最要力气的活儿了,猫了腰,一下一下地,少说也得扫上好几百下。从前这活儿是蹲着干的,打今年就蹲不下了,腿关节就像车轴少了油,一蹲就咯吱咯吱响。身上的气力也差了不少,扫上几十下就要歇一会儿。但我还是要每天每天地扫,我害怕有一天停下来,就永远地扫不动了。然后我就到西墙根儿,把挡在鸡窝口的石块、木板搬掉,看一群母鸡、公鸡活泼泼地跑出来。它们跟在我身后,从西墙根儿跟到东墙根儿,东墙根儿下有间石棉瓦搭的小房,小房里有陈年的玉米粒,我便抓一把撒给它们。这时我看见老黑卧在檐下的台阶上,不屑似的眯了眼睛。它对鸡本就是不屑的,这回的不屑大约也捎带了我了,我带领一群鸡忽而这里忽而那儿的,就像一只抱窝后的老母鸡。

老黑大约有十二三岁了,也到了去那边的年龄了,但它不像我,满头白发,满脸的褶子,它还是二三岁时的模样,大眼睛,大耳朵,墨黑的毛发,腿脚也没毛病,撒起欢儿来会吓得鸡们满院子乱跑。不过只有我知道,它已经老态得多了,从前它每天都要汪汪地叫上几回,午时还颠儿颠儿地往新街跑一趟。现在呢,是没完没了地睡在太阳地儿里,踢一脚都不肯动一动,有人来串门子,它都懒得叫一声了。

新街是我的儿女们住的地方,那条街全是两层的楼房。为让我搬到楼房,儿女们不知费了多少口舌,还是没能把我说动。我说给他们的理由,一是舍不得老房子,二是舍不得老街坊,离

开这两样儿,我会少活几年的。一说少活,他们就没办法再逼我了。其实还有一个理由,我不好跟他们讲出来,就是,在这个院儿里,我不必看哪个的眼色,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想不做了就不做,这份自由,在新街任何一个儿女家里都不会有的。那阵子我的脑子就像有阳光照耀着,什么都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,有一回儿子把汽车都找来了,儿媳帮了收拾着锅碗瓢勺,女儿抱起了床上的被子,可我坚定得就像院门外那盘石磨一样,最后还是让他们两手空空地走了。

院门外那盘石磨已经很多年没人理睬了,人过了时也是一样。儿女们的理睬,就看做是意外的幸事吧。

我坐在一把圈椅上,脚下蹬了只棒子皮编的蒲墩。蒲墩又厚又大,还是我去年秋天编的。每年我都要编几个,送给儿女们坐。他们住了楼房,有了沙发,已经不稀罕了,但碍了我的面子,他们都会装做高兴地收下。今年的玉米还没下种,估摸着长熟时,我身上的力气就更小了,编不动了。

我让圈椅靠了檐下西边的柱子,脸朝了太阳;到下半晌我会把圈椅挪到东边那根柱子,脸还是朝了太阳。我就像院儿里种的葵花一样,太阳去哪儿,我就脸朝了哪儿。我惊异着自个儿的自然,人啊,就这么一天天一年年的,日头拽着似的,多么快啊!

## 2

葵花种在原来的东西厢房的废墟上,已经有一拃高了,小叶子茸乎乎绿扑扑的,看着就叫人喜欢。每年我都要种上一茬,这东西皮实,不挑土,不怕旱涝,只要有阳光,就噌噌地往上长。它

们是那么的喜欢阳光,想必是害怕黑暗的缘故。天一黑下来,我会及时把院儿里的照明灯打开,让光明陪伴它们度过漫长的一夜。儿女们都劝我改种蔬菜,自种自吃,省钱又环保,我没听,从他们搬走种的就是葵花。不为吃它们的果实,只为看了好看,一棵两棵不显,要是几十棵上百棵地聚在一起,那气势就不得了了。风来了,雨来了,太阳出来了,各有各的气势,我总是看也看不够。我常常奇怪,它们怎么就长成了这样子?大脑袋,细身子,乍一看跟个人似的,会叫人吃一惊。它像是不参照不顾忌任何的同类,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自由极了,却又谦逊极了,永远向这个世界彬彬有礼地笑着……

儿女们搬走已有二十几年了,那时候的楼房是要自己盖的,为了省钱,他们就把东西厢房拆掉,拉走了砖瓦木料。他们当然希望也拆掉我住的五间北房,好让他们省更多的钱,但我不答应,他们谁敢动一动?我知道,那一次是伤了他们的心了,这条街上的瓦房都快拆光了,瓦房的砖瓦木料值钱。有盖不起楼房的也一样地拆,说是拆一间瓦房能盖两间平房。各家的儿女们长大了,娶媳妇的娶媳妇,嫁人的嫁人,房子住得紧巴了。

我也不是没动摇过,儿女们不富裕,帮帮他们是应该的,可帮了他们,自个儿的房子就没了,就要今儿住在老大家,明儿住在老二家,像一个挨家讨饭的了。村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,叫做“轮起来”,老人们见了面,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,轮起来没有?我早跟儿女们说过,我是不要轮起来的,人又不是物件儿,挪过来挪过去的。而不轮起来最要紧的,莫过于拥有一处属于自个儿的房子了。

我这五间瓦房,在村里不是最好的,却已经是唯一的了。这

是我亲眼所见,有一天毛毛骑三轮车拉了我,一条街一条街地转了一遍。总共九条街,待转完,我的眼圈都红了。这房子啊,拆个一间两间的不显,拆多了,就成了势了,跟葵花是一个理儿。可葵花是什么势,这拆掉的房子是什么势啊,断壁残垣,碎砖烂瓦,尺把高的野草……就像是死去的野狗,扔在哪儿就是哪儿了,车轧、鸡刨、苍蝇叮,也没人理会了。我要是有力气,就都把那些地方种上葵花,不能拍屁股走了,屎啊尿啊的臭着别人。在废墟之间,还住了不少的人家,就看哪院儿里有树的,门口贴了对联的,门前有几道扫帚印儿的,一定是有人住的了。有一条短马道,印象中两边都是青砖瓦顶的,顶角一只只的龙头,马道的尽头是面大青砖垒就的后山墙。可如今,龙头没有了,青砖瓦顶没有了,后山墙也没有了,就像是一把断了扶手拆了后背的木椅,只剩了光秃秃的底座了。好在,左右两侧的荒草间,还各有几间平顶的砖房,几棵枣树、椿树和洋槐,砖房的烟囱里冒出淡淡的烟气,树们也还算蓬勃。唉,真难为它们了,孤零零的,还有这样的精气神儿。

一边转,我一边抑制着发酸的鼻子跟毛毛讲着老街过去的样子,成排的瓦房,成对的石狮子、上马石,高高矮矮的石阶……毛毛听着却笑了,说,这都什么猴年马月的事了,打记事我就没见过。

毛毛是我的孙女,一九九二年生的,她当然没见过。可她爸文海见过。毛毛说,我爸才顾不得说这些,他忙得饭都不在家吃了。我知道文海在大队部做事。我一说大队部,毛毛就纠正我,不是大队部,是村委会。大队部也好,村委会也好,反正是一样的,都是一群管事、挨骂的人。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也在大队部

干过,很知道里面的深浅,我劝过文海,还是别去蹚那浑水吧。文海不听,他说大伙儿选的,我得对得起大伙儿的信任。我说,呸,挨家挨户地拉票,以为我不知道啊?文海就嘻嘻地笑了,说,我不拉,人家会信任我吗?

如今的事我真是不懂了,信任一个人,不是靠他的品性,而是靠自卖自夸了。毛毛说,拉票算什么,还有送东西送钱的,有的送出去的钱都有几十万了,不过他们上了台,捞的可比送的多多了,什么事一过手没点油水啊。毛毛这么个小人儿,竟是什么都明白的。我问她是不是听她爸说的,她说,这种事不用她爸说,傻子都知道,不图利不起早嘛。毛毛长有和她爸一样的眉清目秀的脸,这张脸有她爷爷的影子,而脸上的长睫毛、宽额头,却是打奶奶这儿来的。她举手投足快捷、麻利,嘴皮子也来得快,这有点像她的妈妈。我喜欢看见她,喜欢指使她做点什么,可我实在不想从她嘴里说出“不图利不起早”的话。望着她,我有些忧心忡忡的,如今的孩子都太聪明了,但愿她还知道,这世上还有不图利也肯起早的事。

回到我住的街上,心情稍好了些,这条街虽也拆掉了不少房子,但荒草不多,废墟上不是种上了老玉米,就是各样的蔬菜,还有的人家,利用残垣断壁搭起了塑料菜棚。这条街上的人,到底不一样。不过还是冷清多了,长长的一条街,竟没见到一个人影。从前,这条街里可是最热闹的,卖烧饼的,卖卤鸡的,铜盆铜碗儿的,磨剪子铰菜刀儿的,吆喝声是此起彼伏。更不要说,两边的上马石上,带孩子玩儿的,聊闲天儿的,下象棋的,是永远坐了人,就没见闲着过。我问毛毛,知道什么叫上马石吗?毛毛说不知道。我不知该怎么跟毛毛说,这街里已看不到一块上马石了,

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,都当四旧毁的毁扔的扔,最好的,也砌了猪棚、牛圈用了。那真是街上的一景,一对一对的,摸上去如捶布石一样的平滑。可如今连捶布石都少见,跟毛毛说了也是白说。唉,日子就像是跑过去的野马一样,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,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### 3

我住的街叫钟楼街,由来是街东头小学门口的一座钟楼。钟楼我是见过的,楼顶八个角,大飞檐,盖了小巧的筒子瓦,看上去就像是飞鸟展开的精致又恢宏的翅膀。以下是和瓦色一致的青砖垛式女儿墙,顶下的大钟,足有一米多高吧,只钟下的开脚就有尺把长。仰头望去,隐约可见上面刻有图案,图间还有一行竖排的文字。听人说,那文字写的是:梁下县边良村公置,道光十二年吉日造。如今小学早迁到新街去了,钟楼也拆掉了,那口大钟更不知去哪里了。记得文涛、文海都是在那儿上的小学,每天从街西头走到街东头,又从街东头走回来。路是不远,却要经常地鞠躬,因为小学老师多是钟楼街上的,和老师碰上不鞠躬是要挨罚的。文涛是文海的姐姐,文海倒没什么,见老师就扎下脑袋,把屁股一撅,很得老师的喜欢;文涛则是能躲就躲,躲不过去了只潦草地点头了事。有几年,她甚至每天从村外绕个大圈子上下学,冬天弄一身的寒气,夏天弄一身的露水。这个文涛,从小就执拗得要命,有点像我,却又总是跟我别扭着,就如同院儿里那只老母鸡和小母鸡,一天到晚地相跟着,却又动不动梗脖子瞪眼睛的。唉,还是不提她吧,一提她心口就有点疼,这地方像是

单归了她,她一来就有动静。

边良是这村的村名,梁下呢,是我老家的县名。我老家的村名叫伊家庄,就是说,道光年间以及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,伊家庄和边良村还都属一个梁下县来着。我知道对梁下,边良村的人都是不屑提起的,因为边良村打五十年代就归了梁上市郊区了,跟梁下没什么瓜葛了,就仿佛扔掉的一件破棉袄一样。世上的人就是这么势利,即便我这个来自梁下的人,为后生们提亲时也绝没想过梁下的闺女,更不要说这里的闺女嫁到梁下去了。这就有点像梁上市和边良村的关系,边良村的闺女总想嫁到梁上市去,梁上市的后生却一样是不屑的。当然这都是文海、文涛那辈人的事了,到毛毛这辈,我就不大知道了,好像梁上梁下讲的不多了,讲的倒是有钱没钱了。我老家的一个侄子国庆,仗着这些年做生意赚了钱,求我为他儿子找个边良村的闺女。我说,边良的闺女可没见过一个往梁下走的。没想到他说,姑啊,这就是您跟不上趟了,如今只要有钱,别说边良,梁上市的闺女也巴不得呢。那回他像是有点感冒,不住地咳嗽,不住地吐痰,一口一口地全吐在了我屋里的方砖地上。我说,还是先管管你这嘴,再说梁上市的闺女吧。

我是十九岁嫁到的边良。我常觉着,自个儿跟边良是有缘分的,做姑娘的时候,婆家这房子我就梦见过多次,青瓦铺顶,方砖砌地,长长的前廊,燕子翅膀一样的挺拔的飞檐……头一回去婆家,我简直都惊呆了,跟梦里的一模一样!我常做的梦,除了房子,还有葵花,那葵花金灿灿的,铺天盖地的,像是什么都没有了,天下净剩了葵花了……我大名叫伊建和,小名就叫葵花。不过在这村里,除了家人还没一个知道我的小名,大名也很少有人

叫,都喊我仁嫂、仁婶的,因为文海他爸叫仁,徐仁。仁从来喊我建和,我在大队部时牛广义也喊我伊建和。牛广义是那时的村支书,开会他总要一个个地点名。除了他俩好像就再没人叫过了。对了,还有“文化大革命”我站在屋中央挨批的时候,不少人也叫过,谁跟谁我如今都想不起来了。我的小名只有婆婆叫过,那还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,她和面忘了把袖子挽起来,便朝我喊道,葵花,过来一下!我一时间怔在那里,记得还是文涛跑过去帮她挽起来的。她平时总喊我仁媳妇,或者是文海妈,那声“葵花”,就像是一下子把我和婆婆的距离拉近了。婆婆她叫了第一声,也是叫了最后一声,可在我这儿,却一辈子都会想着了。

我和婆婆的常态多是沉默,沉默着洗衣做饭,沉默着织布纺花,沉默着收拾一切家务。婆婆有一张大大方方的圆脸,一双充满善意的似随时准备应答别人的大眼睛,嘴唇也不薄不厚,可不知为什么那嘴唇就是不肯轻易地打开。开始我以为她是要端婆婆的架子,后来知道不是,她和儿子和所有的人都这样。仁曾告诉我,他爷爷原来是这一带的名医,开了药铺,置了家业,光一套套的四合院儿就占了半条街。可爷爷也是个能造钱的,有一年忽然抽上了白面儿,自个儿抽,还撵掇儿子抽,没有几年,好好的家就给他们抽败了,药铺没了,四合院儿没了,爷儿俩竟也前后脚地没了,现住的这套四合院儿,还是婆婆拿自个儿的体己钱换回来的。仁三言两语叙说了这事,我竟是一夜没能合眼,沉默寡言的婆婆,原来还有这样惊心动魄的经历,这样的经历她都能搁在心里不吐一字,世上还有什么值得她开口的事呢!不过,我还是觉得她对我这个媳妇有点两样,比如家务,她总是天不亮就

悄悄地起来,淘米、做饭,打扫屋里屋外……待我们起来,这全套的活儿已经做完了。吃过早饭,解放前是给人家拆拆洗洗,缝缝补补,解放后是为儿孙们忙碌,也总是以她为主,我若多干些,她便说,甭管了,我来吧。嫁给仁之前,我一直为八路军做事,几乎没在家待过,我想婆婆也许是要感化我,以使我老老实实做徐家的媳妇,再不要出去担惊受怕。解放后呢,我当了村干部,婆婆应是没这担心了,但像已成了习惯,屋里屋外仍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。她是一双小脚,每天忙下来,都要一圈一圈地打开裹腿,脱下鞋子,再脱下一双白色的粗布夹袜,将脚伸进热气腾腾的水里泡一泡。她的一排脚趾被裹在了脚心,脚面高高地拱起来,每回不经意地看到,我都会转开目光,不忍再看。她每天的泡脚,就像是对那可可怜脚的抚慰,第二天,被抚慰过的脚就又上了弦一般,开始轻轻巧巧地走动了。她的三角形的鞋子和夹袜都是自个儿缝做的,一针一线精致、匀称,鞋底是白洋布滚边,鞋帮是浆过的全黑春富尼,看上去黑白分明,棱是棱角是角,就如同模子里脱出来的。作为儿媳,我是一直想为她做双鞋子的,却一直没敢,因为做仁和孩子们的鞋子,我都是勉强应付,不是鞋帮上歪了,就是鞋底子纳走了形,很多回都要靠婆婆的帮忙才能完成。至于袜子,在我看来比鞋子还要无从下手,那几块布料的拼接,需要什么样的精确度才能合脚啊。

若是仅这样度过我和婆婆的一生,我虽有遗憾,却还算是有福的。可在婆婆去世之后,我才从婆婆的一个侄子狗旦那里知道,婆婆其实是知道我婚前的事的,一切一切,她全都知道!她瞒过了儿子,瞒过了徐家所有的人,也从不跟我提起,她只踮着小脚去过离她娘家不远的南庄一趟,为的是核实她从狗旦那儿

听到的消息。消息核实了,代价却是她很少再回娘家,且不准狗旦再来边良。直到她去世,狗旦才见了她最后一面。狗旦在灵前哭得昏天黑地,称姑姑是他一辈子最敬慕的人,可他却一辈子没机会孝敬。丧事办了三天,三天里狗旦对我一直不理不睬,边良村的人只当他是梁下县的村夫,不懂事理,便没去在意。直到第三天正午出殡前,狗旦才把我叫到门外,说出了真相。狗旦说,我本想也学姑姑的样儿,把这事带进棺材里,可反过来说,姑姑要早说出来,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呢。为了姑姑,今儿我也得当回恶人!狗旦对我是满脸的嫌恶,仿佛他姑姑是我害死的。那天的出殡我没能参加,因为我手脚冰凉,心跳加快,几次几乎昏厥过去。一向疼爱我的仁不顾族人的反对,硬是请一位中医陪我留在了家里。仁自是不知发生过的一切,那些天,我自个儿也直想随婆婆而去,使那发生过的事永远成为无人问津的陈年往事。可在几个昏厥的瞬间,我再一次看到了葵花,铺天盖地,铺天盖地的……以往我总是把它当成一种吉兆,这时我却清楚那不过是自个儿求生的欲望。我生来头一回讨厌起自个儿,也头一回想念起婆婆。我天天没事儿人似的,自欺欺人地以为事情会成为过去,却不知那事情就仿佛不散的阴魂,一直附着在了婆婆的身上……

一想起婆婆,我就知道通宵都不会有觉了。前些年,睡不着了吃片安定,管用得很,就像是阴阳间的一道门,吧嗒就关得死死的,让你睡得跟死猪一样,什么什么都不用想了。我心想人还真有法子,管胳膊管腿,还能管脑子。可后来,一片不管用了,得两片才能把那道门关死;再后来,两片也不管用了,三片、四片地加起来……安定是文涛送来的,她一次只肯送十几片,好像怕

我有一天拿它寻死似的。我暗自好笑,说到底她还是不了解她娘,一个梦了一辈子葵花的人怎么会寻死呢?

如今,文涛送来的安定已经有百十来片了,我扔进一只空瓶子里,懒得再吃一片,那道门爱开着就开着吧,该来的,挡也挡不住,来来往往的人,来来往往的事,阴间阳间还不是一样。

#### 4

南庄,那个婆婆曾踮着小脚去过的南庄,就仿佛是我这辈子的克星,什么时候沾到它,就一准儿会有灾祸找上门来。

那是一九三七年的事了,我刚刚十五岁。

父亲白天下地,母亲在家带着我和两个弟弟。我有时带两个弟弟玩儿,有时帮母亲缝缝补补,有时还趴在炕桌上写父亲教下的字。我识的第一个字是人,第二个字是家,第三个字是国,后来识的字多了,就记不清哪个先学哪个后学了。我做针线活儿不肯用心,老是出错,母亲是个急脾气,一错就要骂上几句,父亲却从没骂过,他总是说,针线活儿没好有坏,傻子也会,念书傻子可就不行了。

我喜欢父亲在家,父亲一在家,天就黑下来了,星星们就上来了,母亲就不急不骂了,一切都变得好起来了。更好的,是父亲肚子戏文,那戏文多得,就像他在院儿里种的葡萄,一串儿一串儿的。他讲《定军山》、《阳平关》,讲《大保国》、《二进宫》,讲《文昭关》、《浣沙记》,还讲《李逵探母》、《林冲夜奔》……讲着讲着,左邻右舍的也一个个地来了,招呼也顾不得打,接过母亲递给的蒲墩坐下来就听。我们家的院子不大,一个葡萄架一个

菜窖就占严了,大家便坐在葡萄架下,摇了蒲扇,听父亲讲啊讲的。到了冬天,有的坐在炉前,有的坐在炕头儿上,四周都是暗的,唯有炕前的炉子一圈火红。大家的影子映在墙上,你挡了我我挡了你擦起来了似的,其实看看各人,谁在谁的位,全没什么相干。父亲像是有点人来疯,人一多就不一折一折地讲了,讲整出,比如《红鬃烈马》,他通常多是讲其中的《武家坡》、《大登殿》,要讲整出可就长了,就要从薛平贵、王宝钏年轻时候的《花园赠金》讲起了;人呢,也不坐着了,站起来又念又唱又比画的。他记戏词一绝,段子再长人物再多也不会弄错。比如《文昭关》和《捉放曹》里都有一段二黄慢板,开头一句都是“一轮明月”,但一个是“一轮明月照窗前”,一个是“一轮明月照窗下”,父亲就从没有错过。父亲说,戏词是要押韵的,前是“安”韵,下是“啊”韵,韵错不了,词就错不了了。这一说,大家就更佩服了,一样地扛锄头种地,他脑子里的东西咋就装得多呢?这时候母亲就说,他那东西没在脑子里,都在兜儿里呢。小时候,我真就去掏父亲的衣兜儿,大家便哈哈地笑起来。我喜欢林冲这样的人,有本事,对娘子还好,不像李逵那么粗鲁,好容易孝敬老娘一回还让老虎把老娘吃了;也不像《文昭关》里的伍子胥,那么多疑,一路上多少好人帮他,他还非逼得人家寻死不能相信;更不像定军山里的黄忠,老了还不服老,人家越激他他越逞强。父亲对黄忠可不这么看,他说,那不是逞强,是忠义,要不是忠义,他七十岁的人哪能打一仗胜一仗的?对伍子胥的多疑他也很能理解,说一个全家都被杀了的逃亡人,要是不多疑才怪呢。我不肯认输,就打岔问父亲什么叫逃亡?父亲说逃亡就是逃生。我说亡不是死吗,怎么又成生了?父亲说,亡在这儿就不是死的

意思了,就是逃跑的意思了。这时候母亲就说,生啊死啊的,较这真儿有什么用?再说了,七十岁八十岁还不是编戏的说了算,一个戏,又不是真事儿,一个比一个死性。母亲这一说,就把我和父亲的嘴都堵了,她不识字,不想听我们掰扯字的事。不过我从小跟父亲学识字,还是她撺掇的,弟弟建昌、建平学识字的事,她也开始跟父亲念叨了。母亲就是这么个人,什么事她说出来才能算数。

一块儿听父亲说戏文的,还有腊八叔,冬至伯,小五子,黑人儿爷爷,傻秋叔和傻秋婶子……他们大多姓伊,有远门的,有近门的,不姓伊的也是伊家的媳妇,比如傻秋婶子,她姓阎,叫阎花。傻秋叔其实不傻,约莫三十来岁,一个周周正正的文静人儿。别看他不识字,父亲讲过的段子,谁跟谁哪挨哪他都一清二楚,有人问起来了,人们都会朝他一指,问傻秋去。傻秋婶子阎花看上去倒是有点憨傻,粗眉毛,大眼睛,一对红嘟嘟的嘴唇,嘴唇厚得都快要拱到鼻子了,鼻孔害怕似的,使劲儿朝天上撅着;而那眉毛,粗也不是那粗法,左右挨得近不说,还上上下下地长,就像两把乱糟糟的野草。母亲说,人甭看相,你婶子可不傻,心眼儿比筛子眼儿都多。我本就不信她那样的人会喜欢听戏文,果然后来就发现,她是来跟踪傻秋叔的,傻秋叔来她才来,傻秋叔走她一准儿走,有时候傻秋叔去趟茅房,她也要跟了去。有一回听母亲对父亲说,也难怪,傻秋有人儿呢。我问什么叫有人儿,母亲就呵斥我说,小孩子家少打听!不过我挺可怜傻秋叔的,周周正正个人,怎么就有了阎花那样的媳妇呢?仿佛是为了傻秋叔,我从不管阎花叫婶子,也很少跟她说话,躲不过了就嗯嗯啊啊的。她果真是不是不傻的,有一回就跟母亲说,你家葵花可不是一般人



儿,眼皮子高。母亲说,她惹着你了?她说,没有,就算惹着了,我这当婶子的还能不让着她?我是掂量着,给她找个好人家呢。

阎花这话,母亲自是没当回事,阎花虽说还算近门的媳妇,也热心说媒拉纤儿的事,但母亲早说过,我们家的闺女十八岁以前是不嫁人的。我知道她这是受了父亲的影响,父亲识文断字,这些年还跟小学校的几个老师常有来往,他们的话她也许不全懂,但她愿意做出懂的样子,她看不起那些只知道种地的死庄稼主儿。可她自个儿也没想到,我刚刚十五岁,她竟是求上门去,找阎花说亲去了。

原因来自全世界都知道的那场日本鬼子的侵略。

一九三一年日本先占了东北,到一九三七年又把军队开到了天津、北平,这俩城市一被打开,紧接着自然就是华北平原了。那以后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,有说日军在平津一带已屯兵几十万,只等一声号令,就往南开过来了;有说国军也不是孬种,那二十九军、五十二军、五十三军的将士,正在与日军浴血奋战,谁胜谁负还未见分晓呢;还有大骂日本兵的,说日本兵如何如何不是东西,见了男人就杀,见了女人就辱,天津、北平一些地方都血流成河了……那时的父亲显得忧心忡忡的,白天不拿家什就出去了,晚上还回来得挺晚,也不知在忙什么。有一晚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,缠了他说戏文,他却叹口气道,国军节节败退,小日本的贪心又大得很,这一南下,恐怕就不只是华北的事了。我怔怔地看他,见他目光对了母亲,显然没听到我的话。就听母亲说,你呀,先甭想那么远了,先顾眼前吧,万一日本人来了,咱一家子逃是不逃?父亲说,看看再说吧,要逃也是你带孩子们走,我是不能逃的。母亲说,你不逃我们也不逃,要死咱死在